

软实力：一个概念的演进

(美)约瑟夫·奈 著 俞平 译

【译者按】本文回顾了自1990年提出以来,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演进。描述了作者对实力的研究方法;解释软实力概念在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辩论中的源起;并回应对这个概念的一些批评。然后,讨论了锐实力(sharp power)所代表的高压政治和唯意志主义,最后描述了该概念在几个国家的政策利益方面的演变。

【关键词】软实力;硬实力;锐实力;唯意志主义政治实践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俞平(1980-),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副主编。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沪),2022.6.78~87

伊万·巴卡洛夫(Ivan Bakalov)在本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的工作是“软实力学术文献中的主要参考点”^①。我从来没有说过是我发明了软实力这一概念,这么说是很荒谬的,因为权力行为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正如巴卡洛夫所说:“即使软实力实践起源于其他地方……学者们仍然承认,这位哈佛教授是创造了‘软实力’一词的人,并仍将他们反对他的论点并置起来。”^②

所有概念的出现都是有特定语境的,而语境又是会变化的。斯蒂芬妮·温克勒(Stephanie Winkler)详细追溯了过去30年来软实力概念的发展史。^③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对思想和政治行为之间相互作用感兴趣的人,我希望描述我如何看待软实力概念的演变,即便这样看起来有过度自我参照之嫌。我的观点当然不是定论,但至少是有其独特性的。

一、我对权力的定义

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没有哪个定义被所有使用这个词的人所接受,人们对定义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兴趣和价值观。有些人将权力定义为改变或抵御改变的能力;有些人认为这是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这个宽泛的定义包括对自然和对他

人的权力。鉴于我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领域的专业背景和兴趣,我就从简单的字典定义开始,即权力是做事的能力,但更具体地说,在社会环境下,是影响他人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因素随着关系的不同而变化。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传承的社会力量组成的网络中,其中一些是可见的,而另一些则是间接的,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的”。我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识别并关注其中的一些约束和力量。例如,社会权力在个人行为背后默默运作,塑造了潜在的社会结构、知识系统和一般环境。^④虽然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力量很重要,但鉴于我对外交政策的兴趣,我想了解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者或执行机构能做什么。文明和社会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有效的领导可以试图以不同程度的成功来塑造更强大的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我们想知道一个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者能够执行他自己的意愿的可能性。^⑤

即使首先关注特定的行为者或执行机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某一行为者“有权力”,而应该明确是“做什么”的权力。^⑥我们必须明确谁参与了权力

关系(权力的范围)以及所涉及的主题(权力的领域)。权力暗含着因果关系,一定程度上权力和“原因”是近义词。当谈及因果关系时,我们会有选择地关注漫长而复杂的事件链中特定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因为相较于我们可能关注的无数其他事件,这二者更让我们感兴趣。我们不会抽象地说“事件导致了结果”,而不具体说明到底导致了什么结果。

一个精神病患者可能有能力随机杀害或伤害陌生人,但却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一些人认为,这种暴力行为不应该被称为“权力”,因为这并不涉及双向关系,但这取决于背景和动机。如果行为者出于恐怖主义动机,那么使用武力符合我对权力的定义,即影响他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许多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对象的想法,这正是软实力的一个关键方面。

务实的政客和普通人经常发现这些关于行为和动机的问题太深奥和不可预测。行为定义通过在行动之后(“事后”)而不是在行动之前(“事前”)导致的结果来评估权力。但决策者希望事前的预测能有助于指导他们的行动,因此,他们经常简单地根据能够产生结果的资源来定义权力。这就形成了权力的第二种定义,即权力是一种资源。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相对较大的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稳定的社会,那么它就是强大的。第二个定义的优点是,它使权力看起来是具体的、可衡量和可预测的,像一份行动指南。这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常见的做法,尽管有时这会误导我们。

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就像在纸牌游戏中拿到一手好牌。但这个定义存在重大问题。人们通常认为权力是(可能)产生结果的资源的同义词,但随后他们会遇到一个悖论:那些最常被赋予权力的人并不总是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权力资源的有效性取决于具体情境。例如,拥有优越的战斗坦克帮助美国在沙漠战争中战胜了伊拉克;但在越南的沼泽和丛林

中,他们并不那么成功。

这并不是要否认权力资源的重要性。权力是通过资源来传递的,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如果你在扑克游戏中亮出大牌,其他人可能会选择放弃游戏,而不是挑战你。但是在一场游戏中获胜的权力资源在另一场游戏中可能毫无裨益。就像在打桥牌时,一手好牌也未必会赢。即使是扑克,如果你玩得不好,或者被对手虚张声势所欺骗,你仍然可能输。权力转换——从资源转换到行为结果,是一个关键的干预变量。拥有权力并不能保证你永远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尽管如此,从我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的经验中发现,用资源来定义权力是决策者经常使用的一条捷径。一般来说,一个拥有良好权力资源的国家更有可能影响一个较弱的国家,并且在决定最佳战略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反之亦然。较小规模的国家有时可能会因为选择较小的战斗或有选择地关注一些问题,而获得理想的结果。玩游戏时,你首先应该弄清楚谁手握大牌以及他们有多少筹码。同样重要的是,决策者必须具备背景情报,以了解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在特定的环境下,哪些资源为权力行为提供了最佳的基础?在工业时代之前,石油并不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权力。同理,在核时代之前,铀也不重要;在数字时代之前,大数据也不重要。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中,战争是国际政治的终极王牌。当所有底牌都亮在台面上,就能够估计出相对实力。但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战争的实力来源经常发生变化。此外,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问题上,战争并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军事资源并不能解决气候变化或大流行,然而国家安全战略以及预算分配不成比例地倒向军事资源而不是公共卫生资源,导致美国新冠肺炎病毒的致死人数超过1945年以来所有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之和。而1918年大流感的致死人数也超过了一战四年的死亡

人数。

我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要素”(人口、经济、军事)方法具有误导性,尤其是相较于20世纪下半叶在国际关系研究之外占主导地位的社科分析的行为方法或关系方法,前者更显力有不逮。后者认为,权力资源只是构成权力关系基础的有形和无形的物质或工具,而在给定的资源条件下,是否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则取决于环境中的行为。工具本身并不是权力关系。已知一辆车的马力和里程数,并不能确定它最终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

在实践中,外交政策中关于权力的讨论同时涉及这两种定义。根据我在政府领域的经验,在日常使用中的许多术语,如“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是结合资源和行为的混合体。在此背景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我们说的是基于行为的权力定义还是基于资源的权力定义,并意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完美关系。例如,当人们谈到中国或印度的崛起时,往往会指出这些国家的庞大人口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或军事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所暗示的能力是否能够实际转化为预期结果,将取决于环境和该国将资源转化为预期结果的战略技能。最后,由于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资源,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环境和权力之间的转换战略。

二、软实力概念的缘起

我发展了软权力的概念,同时试图解决两个谜题,一个是学科的,另一个是关于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专业寻求剔除所有无关细节的精简结构模型,因此备受关注。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著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对“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优雅表述,它为“奥卡姆剃刀”原理牺牲了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丰富性。大约在同一时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我合作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

tion),该书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因为我们试图聚焦于日益重要的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

然而,标签误导了大家,因为基欧汉和我从未拒绝过现实主义。我们认为,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资源)的解释价值因世界政治的不同背景而不同。我们发展出三种理想模型:严重基于传统权力元素的整体权力结构;问题结构模型,强调特定问题领域的权力资源;复杂的相互依赖型,其中国家不是唯一的重要行动者,安全不是主要问题,军队也不是主要的权力资源。我们认为,分析家们应该从权力和现实主义的整体结构开始,但不要止步于此。然而,在学者们使用标签将概念分类的狂热中,这个建议被彻底忽视。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获得权力的一种方法,这并没错,但也是不够的。为了避免贴上这样的标签,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者”(liberal realist),并提出分析家们应该从现实主义开始,进而拓展开去。^⑦我不认同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者从传统的权力要素出发,而是他们仅止于此,却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这就是我在“新现实主义 vs. 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的学术境况。^⑧与此同时,引起我兴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权力正在衰落这一普遍观点。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是其众多著作中最突出的一部,其中提到,美国正在经历帝国的过度扩张,其权力正在衰落。我也在许多政策论坛上与肯尼迪辩论,并在1989年决定撰写《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来解释我为什么不同意他的观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用传统的经济和军事术语评估了美国的权力资源,但我觉得仍然缺少了一些东西。美国之所以能得到它

想要的结果,也是因为吸引力,而不仅仅是靠武力或经济胁迫,我称之为“软实力”,并试图理解它的起源和维度。将它与基于武力或经济胁迫的硬实力区分开来。

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逐渐遗忘,但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确对苏联的权力怀有极大的恐惧和夸大。然而,华尔兹所强调的硬实力资源双极结构的稳定性被证明是虚幻的,部分原因是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的缺陷,但软实力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二战后分裂欧洲的铁幕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但最初却是因为共产主义抵抗法西斯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然而,其后苏联使用硬实力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其软实力因此遭损。柏林墙最终在1989年倒塌,但并非毁于炮火攻击,而是被那些受到西方软实力影响的人用锤子和推土机推倒的。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在欧洲也建立了一座帝国,但盖尔·伦施塔特(Geir Lunstadt)却称它是“受邀的帝国”。^⑨这种软实力上的差异促成了冷战的和平结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各种有关美国衰亡的论调频出不久后苏联就解体了。这也是促成我撰写《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和“软实力”这一概念诞生的因由。

这些学术和政策上的难题有助于产生软实力这一概念,但具体情境也有助于形塑这一概念。与纯数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受到当代政治辩论背景的影响。当我试图阐述想法时,我阅读了最近关于政治权力的文献,并意识到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关于国内民主政治中关于权力精英和社群权力的辩论的影响。当他们使用行为而不是资源定义,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借用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的经典论述,即权力意味着迫使一方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非调整自身以适应国际环境。正如巴卡洛夫所说:在概念层面上,奈的目标是超越的“经典权力平衡”来理解世界政治。他试图确定一个更

广泛的权力概念,不限于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A控制/支配B的情境,但包括A与B一致实现预期结果的实例。通过区分“对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对结果的权力”,奈捕捉到了权力的这一面向。这种方法“以行为者为中心,关注关系和战略”,符合对外交政策的利益。

正如巴卡洛夫还指出的那样,我的方法也导致了关于软实力这一概念存在一些瑕疵,以致我后来不得不澄清,以回应批评。一是对资源在区分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作用的描述较为模糊。我最初写道,让别人与你心向一处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联系在一起”。我使用了权力的行为定义,但我试图使它与使用资源定义的常见政策实践相一致。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准确地指出,可感知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标准,我认同这一点。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我的言语描述可能会导致“软实力现在意味着一切”的错觉。一些人用这个概念指涉军事力量以外的一切。这是不正确的,我试图在《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⑩中通过重申行为定义的首要地位来澄清这一点。正如我所说:“许多类型的资源都可以促进软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软实力是任何类型的行为。使用武力、经济制裁和其他一些基于这些手段的议程设置,我称之为硬实力。而被目标、积极吸引力和说服力所定义的合法议程设置,则是软实力所包含的行为光谱(spectrum of behaviors)中的一部分。硬实力是推动力,软实力则是拉动力。”或者扩展一个常见的比喻,硬实力就像挥舞的胡萝卜或大棒;软实力更像一块磁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通常与硬实力相关联的资源也可以在另一种环境中产生软能力。例如,2004年,当美国海军舰艇向印尼提供海啸救援物资时,民调显示,印尼对美国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一些资源可以同时产生硬实力和软实力,例如1948年的

马歇尔计划。

多年来,许多批评者认为,我的政策兴趣导向了自由主义价值观或所谓美国式价值观。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对冷战结束时的相对权力很感兴趣,而且许多西方价值观比当时的苏联价值观更具吸引力。但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吸引力是一个经验问题,与特定时代和情境相关;而不是软实力概念中一成不变的必然。吸引力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可以由善良、能力或魅力产生。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受众的思想。特定的文化资源,如好莱坞电影,可能会在巴西产生吸引力,同时也会在沙特阿拉伯产生排斥。我试图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阐明这一点,该书在我严厉批评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中东政策。^①吸引力本身并不是自由的或西方的。例如,在逊尼派穆斯林中,沙特阿拉伯拥有很大的软实力。它与金砖国家这样的组织类似,可以是自由主义国家,也可能是威权国家。即便反自由主义的行为会遭到一些人的抵制,但也可能受到其他一些人的拥护,构成行为者的软实力。本·拉登没有强迫或用金钱收买摧毁世贸中心塔的飞行员,他是以一种特别极端的宗教形式吸引了他们。我在《灵巧领导力》(*The Powers to Lead*)^②一书中试图澄清这一点,将软实力的概念应用于各级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应用在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上。

软实力这一概念另一个需要澄清的方面是,它与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权力的三张面孔”(three faces of power)之间的关联。^③遗憾的是,我是在出版了我的著作后才看到他的研究成果。正如卢克斯所指出的,软实力与他的“权力的第三张面孔”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软实力的概念是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且包含了议程设置的自愿性以及通过对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进行自身的偏

好设置。我更关心的是执行机构的行为,而非“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一存疑的概念。卢克斯称软实力是他提出的“权力的第三张面孔”的“表亲”。我非常欣赏他的研究,并在我2011年的著作中讨论了软实力与“权力的三张面孔”的关系。

三、唯意志主义与高压政治

另一个有趣的批评是,软实力并不“软”,而是可以包括强制的元素。行为者会影响目标群体的思想,也会扣住目标群体的“手臂”,这就模糊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区别。我同意这一点,但我不认为这削弱了我的论点。我把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区别描述为一个行为光谱,一端是以命令执行为代表的典型硬实力,另一端则是以合作代表的典型软实力。红蓝是颜色光谱的两端,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但中间的不同深浅的紫色就很难具体划分为红色或蓝色的类别。我认为有些权力行为也是如此,例如议程设置。如果行为主体欺骗了目标群体,并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这一结构性操控就符合硬实力的范畴;如果目标群体认同行为主体的议程设置,认为其是合法的,这种行为就更适合软实力的范畴。

鲍德温指出,“光谱是一种说明单一维度不同程度的方式”,而权力有许多维度,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用一个连续体表示。^④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人们甚至可以在概念中构建其他维度,尽管这样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在一次私人会晤中,我曾经被建议可以换一种基于二维的概念表述:横轴代表目标群体对称和非对称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纵轴代表行为者直接和间接的操纵。

这将产生四种权力类别:强制性、结构性、交易性和吸引力。硬实力行为包括强迫、结构性操纵和经济约束。软实力行为包括积极的吸引和说服。将结构性权力本身视为一种行为类别,而不是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既有好处,但也有问题。环境总是会限制一定的选择和信息。结构性权力通常与强迫、诱

导和操纵联系在一起。在我的方法中,结构作为一种权力资源非常重要,但它本身不是一种行为形式。操纵,或结构性安排,则是权力行为,而对结构的操纵可以包括行为者故意使用误导或虚假信息来影响目标群体的行为。

引入锐实力这一概念后,唯意志主义和高压政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认为,面对俄罗斯等国锐实力的扩张和完善,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应该重新思考他们应对的政策工具。他们将锐实力与软实力做了比较,前者“刺探、渗透、破坏目标国家的政治和信息环境”,后者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提升国家实力。行为者利用意识形态作为权力资源,这本身并不构成软实力行为,除非是基于积极良善的目的。战略沟通、宣传和信息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锐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尽管这两个术语有时会相互混淆,因为它们都关注目标对象的思想。宣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目标群体认定这就是宣传手段,那么宣传就缺乏可信度,因此无法吸引人。但如果宣传吸引了人,它就可以产生软实力。光谱上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的分界线有时就像颜色光谱上红色和蓝色之间的区别。

我将权力行为光谱集中在目标对象的唯意志主义程度上。在硬实力行为中,胁迫通过消极制裁来剥夺目标对象的选择权;交易诱导则通过操纵积极制裁,描绘愿景,来改变目标对象的选择。在软实力行为中,吸引力可以是直接的,没有有意为之;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沟通进行调解。说服力(或营销)是一种居间吸引力,行为者有意构建沟通策略。适度的沟通策略能够使目标对象保留选择权,因而能够提高行为者的吸引力,这就是软实力。而极端的沟通策略(如谎言)则严重扭曲现实,剥夺了目标对象的选择权,成为高压政治的硬实力。软实力依赖于目

标对象是否拥有足够的自愿选择权,分析观察者是否能将目标描述为被积极吸引。软实力并不依赖于现实实情,而是取决于行为者呈现真实或虚假信息的意图。

行为者的意图可以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恶意的;软权力可以作为对抗第三方的武器,也可以吸引一部分目标群体,使之与其他目标对象对立起来。权力行为的柔软性取决于目标对象自愿被吸引的程度。2016年美国大选中,俄罗斯在脸书上发帖,公布了一些真实的信息,吸引了一些美国人,并使他们站到了国人的对立面。在这些情况下,软性力量被用作武器,但当它依赖于自愿吸引时,它仍然不同于锐实力。在某些情况下,软实力被用作武器,但它与锐实力仍有不同,因为它建筑于目标对象自愿被吸引的意愿。而在另一些情境下,软实力与锐实力拥有相同的工具效应,但它们的基本概念仍是完全相悖的。当然,在光谱上区分红色和蓝色总是很困难。如果唐璜引诱一个被他吸引的女人,那就是软实力;但如果他使用武力或撒谎来求婚,他的行为就违背了对方的意志,属于硬实力。如果她因为被吸引而给他钱,这是一种软力量,但如果赠与是因为虚假承诺诱导,这就是硬实力。

互联网时代,民主国家日益面临着如何在政策层面应对威权主义干预,这一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假设。一位观察家认为,“如今,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区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软实力本身正在被武器化。”^⑤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锐实力和软实力的运作方式非常不同。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区别可能很难辨别,这使得应对锐实力成为一个困难的政策问题。所有的说服都涉及如何构建信息。只有当这种说服变成一种欺骗,限制了目标主体的自愿选择权,说服才会越界成为胁迫。

正是这种特质,即开放性和对有意欺瞒的限制,

区分了软实力和锐实力。当对锐实力做出回应时,必须小心,不要与对方的锐实力正面冲突,甚至展开锐实力的竞争,从而削弱自己的软实力。民主的软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公民社会——在美国,它来自好莱坞、大学和基金会,而不是官方的外交。封闭或终止开放性将损害这一关键政治资产。威权国家的软实力构建面临一定困难,正是因为它们不愿释放其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开放是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关键来源,而使用锐实力政策工具反而会削弱软实力优势。这些都是全新的政策问题,与1989年我提出软实力概念时感到困惑的问题完全不同。

四、软实力概念的政治实践

当我发展软实力的概念时,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学术概念,以填补国际关系领域对权力研究的不足,但令我惊讶的是,它逐渐引起了更广泛的政治共鸣,成了一个为领导人所用的概念。如前所述,潜在的权力行为并不是新鲜事物,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以及其他古老文明中。虽然我在研究美国权力的背景下发展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但它并不局限于美国。随着欧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开始提及其软实力,或许也是为了平衡其军事资源(硬实力)的不足。但欧洲市场的规模,加上欧洲重视设立单一市场监管标准,使欧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硬实力,《经济人》杂志称之为“布鲁塞尔效应”(Brussels effect)。除了经济硬实力外,欧盟的多边合作模式和援助计划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软实力吸引力。无论如何,软实力这个词对欧洲政治精英们非常实用。

最初,美国领导人并不经常使用这个词。美国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更认同强硬而不是温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开始使用这个概念的竟然是军队。例如,2002年,当一位将军问国防部长他对软实力的看法时,这位部长竟反问他什么是软实力。这种态度在“9·11”之后的安全恐惧时期,常见于政治领导人中。在这种恐惧的氛围里,很难讨论软实力,即便吸引温和派不受激进派的蛊惑是军队反恐战略

的组成部分。直到2007年,美国海军宣布软实力作为其战略的组成部分。^⑩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随着对伊拉克的入侵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我觉得应该利用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为政策界更详细地阐明软实力的意义。一些学者错误地将软实力描述为“文化和商品等非传统力量”,不屑地认为“这就是所谓的软”。^⑪一位国会女议员私下告诉我,她个人认同这个概念,但不可能用它来向那些想听到强硬言论的政治听众发表讲话。2004年,我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概念。我还解释说,软实力只是国际关系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本身并不足以产生效果。将硬实力和软实力与成功的战略结合起来,使软硬实力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削弱,可以被认为是“巧实力”(smart power)(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使用了这个词)。我在《权力大未来》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概念,包括在网络领域。虽然我在这本书中更充分地探讨了这些概念的各个方面,但中心定义(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力,而不是强迫或经济手段来影响他人,及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始终保持不变。

2007年,随着伊拉克局势继续恶化,我担任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Smart Power Commission)的联合主席,向政策界推广这一概念。在各方参与下,我们希望利用软实力和巧实力来推行美国外交政策。随后,在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公开呼吁加大对软实力的投资。几年后,另一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表示,如果国会不投资于软实力和国外援助,就将不得不给为军队购买更多的子弹。“巧实力”这一概念隐含着刻意的规范性,而不仅仅是分析性的。

使我更惊讶的是,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命运。随着中国硬实力资源的发展,领导人意识到,软实力也同样重要。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决策,因为日益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能会使邻国产生畏惧,进而

结盟以求平衡地区实力。但是,如果发展是伴随着软实力的同步积累,那么就很有可能打消邻国结盟的动机。自2007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持续表达了发展和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意愿与决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其令人印象深刻经济增长记录、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吸引力。但民意调查显示,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包括亚洲),中国的整体吸引力仍落后于美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软实力等概念就像孩子一样。作为一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你可以在幼年时爱护、管教它们,但随着它们的成长,他们就会离你而去,结交新的朋友,此时你已无能为力。巴卡洛夫认为,软实力概念的三个方面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保持稳定:即通过直接或间接改变外部目标受众的态度来发挥作用;与硬实力相比,它有更长的运行时间范围,更适合实现一般目标,而非具体目标;它并不完全由政府控制,公民社会也是主要力量。^⑧或者正如鲍德温总结的那样:“奈关于软实力的讨论刺激和澄清了决策者和学者的思想——甚至是那些误解或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⑨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能希望的一切。

原文来自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10 Feb. 2021。

注释:

①Ivan Bakalov, Whither soft power? Divisions, milestones, and prospects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12, 2019, p. 130.

②Ivan Bakalov, Whither soft power? Divisions, milestones, and prospects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12, 2019, p. 130.

③Stephanie Winkler, Conceptual politics in practice: how soft power changed the world, *Stockholm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2020.

④Peter J. Katzenstein(ed.),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⑤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1947, p. 152.

⑥Jack Nagel,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ower*, New Haven: Yale UP, 1975, p. 14.

⑦Joseph Nye, 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⑧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XL, 2, 1988. Stefano Guzzini, Structural power: the limits of neorealist powe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1993, pp. 443-479.

⑨Geir Lundstadt,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⑩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⑪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⑫Joseph Nye, *The Powers to Lea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⑬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Palgrave, 2005.

⑭David Baldwi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pproa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66.

⑮Zaki Laidi, *The hardening of soft power*, 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4, 2019.

⑯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

⑰Niall Ferguson, Think again: power, *Foreign Policy*, Feb. 2003, pp. 18-22.

⑱Ivan Bakalov, Whither soft power? Divisions, milestones, and prospects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12, 2019, p. 134.

⑲David Baldwi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pproa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71.